

BI JIAO JIAO YU YI CONG

比较教育译丛

顾明远 主编

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

——今日比较教育

〔英〕埃德蒙·金 著

王承绪 邵 珊 李克兴 徐顺松 译

王承绪 校

● 人民教育出版社

比较教育译丛

别国的学校和

Bieguode Xuexiao he

我们的学校

Wuomende Xuexiao

——今日比较教育

Jinri Bijiao Jiaoyu

[英] 埃德蒙·夸著

王承绪 邵 珊 李克兴 徐顺松 译

王承绪 校

人民教育出版社

·北京·

OTHER SCHOOLS AND OURS
Comparative Studies for Today

EDMUND J. KING

University of London King's College

FIFTH EDITION

1979

Copyright ©1979 Edmund J. King.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London • New York • Sydney • Toronto

著作权登记号

图字：01 - 2001 - 0134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 / (英) 金 (King, E. J.) 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

(比较教育译丛/顾明远主编)

ISBN 7-107-13948-7

I. 别…

II. 金…

III. 比较教育—研究

IV. G40-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9968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7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19.5

字数: 490 千字 印数: 00 001~3 000 册

定价: 34.40 元

出版前言

人民教育出版社在“九五”期间编辑出版了一套《比较教育丛书》共 10 本，由中国教育学会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顾明远教授亲自担任总主编。那套丛书的目的是为了系统总结 80 年代以来中外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新经验，推动我国的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促进我国比较教育学科建设，向世界展示中国比较教育界的研究成果，扩大我国教育发展经验的国际影响。丛书出版后在社会上引起了普遍的好评，荣获了第一届全国优秀教育图书奖，其中的若干本还同时获得了由不同主办单位颁发的省部级奖和其他奖，圆满地达到了编辑出版那套丛书的预定目的。

比较教育，是教育科学的分支学科；它也是一个研究领域，要比一门学科大得多；它同时还是一个国际论坛，它的对象是教育的整个领域。由于它兼有研究领域和国际教育论坛的特点，所以承担着不同于其他任何学科的独特任务。可以说，比较教育研究的触角伸向教育学科各个领域和分支，它的研究领域是非常广阔的。比较教育又是一门最贴近现实的学科，最能体现时代的气息，尤其在教育呈现出国际化趋势的条件下，比较教育研究更是大有作为，在这一领域内还有许多工作可做，是一个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领域。因此我们深感有必要把编辑出版《比较教育丛书》的工作在“十五”期间继续下去，拓宽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加大研究的深度和力度。

《比较教育丛书》将续编为《比较教育书系》，它分为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的系列：《比较教育论丛》和《比较教育译

丛》。《比较教育论丛》是由我国的专家学者们撰写的比较教育专著；《比较教育译丛》精选国外著名专家撰写的在国际上有影响的著作，作者都是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学者，有的还是比较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代宗师，他们的著作是每个从事教育科学工作尤其是从事比较教育研究的人士必读的。尽管各位作者的观点和方法不尽相同，但是我们相信读者通过研究与鉴别，能从中吸取有益的学术营养。

《比较教育论丛》和《比较教育译丛》的内容基本上可分为四大类。第一类涉及宏观的教育改革研究，第二类是关于各级各类教育改革的专题研究，第三类是关于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的研究，第四类是关于比较教育学科本身的理论研究专题。

《比较教育论丛》和《比较教育译丛》，是人民教育出版社奉献给我国新世纪教育的一份礼物。谨向各位作者、译者和一切关心、支持这两套丛书的同志们，致以衷心的感谢。丛书中的不足和缺点，欢迎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0年7月25日

序

顾明远

比较教育在我国从恢复之日起发展到今天已经整整 20 年。记得 1980 年，我在北京师大担任教育系主任，聘请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胡昌度教授来系给学生开设比较教育课程。同时邀请九所大学从事比较教育的老师来听讲。胡昌度教授又单独为我们这些教师讲解了比较教育方法论的课程并共同研讨。三个月以后，我们十多位教师商量，应该组织起来，编写一本中国自己的比较教育课本。为了编好这本书，我们把王承绪、檀仁梅、朱勃三位老前辈请出来指导。经过两年多的研讨、编写，终于在 1982 年出版了我国建国后第一本比较教育教材。可惜檀仁梅教授因病未能参加后期编写工作，所以大家不大知道他。

1981 年，在保定召开第三次外国教育学术研讨会，与会代表一致决定，把 1979 年在上海成立的全国外国教育研究会改名为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从此，比较教育在我国蓬勃发展。1980 年我们第一次参加了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于日本埼玉县召开的第四次大会，1984 年我国比较教育研究会成为世界比较教育学会联合会的成员。从此，我们比较教育也走向了世界。

20 年来，比较教育研究出了大批研究成果。从简单介绍外国教育情况，深入到专题研究，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了外国的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教训。

在比较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版界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特别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一直关注着比较教育的研究和成果的出版。1979

年，它最早出版了一套《外国教育丛书》，以后连续出版了几本比较教育的教科书，还翻译出版了几部有代表性的著作。“九五”规划期间，我们在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支持下编辑出版了一套《比较教育丛书》共 10 册。这套丛书不仅检阅了比较教育界的研究成果，而且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果。

20 世纪 90 年代是世界教育改革最频繁的年代。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信息时代的到来，都给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各国教育改革也有许多新经验。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必须了解世界教育改革的新动向和研究的新成果。因此有必要把《比较教育丛书》继续编下去，以满足广大教育工作者的需要。

我和王承绪教授还有一个心愿，为了比较教育的学科建设，一定要把比较教育学科发展近二百年来的有代表性的著作翻译出版。现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决定出版《比较教育论丛》，并同时出版《比较教育译丛》，我们的愿望可以实现了。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先出其中几部，有的过去已出版过，这次对译文进行修订后再版，纳入到《比较教育译丛》之中。

《比较教育论丛》和《比较教育译丛》这两套丛书是比较教育工作者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千年之交献给我国读者的一份礼物。我相信，读者会从中获取有益的信息，同时它将激励比较教育工作者进一步努力，在新的千年中取得更多的研究成果。

2000 年 7 月 23 日

写于求是书屋

(作者是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全国比较教育研究会理事长，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

2000 年中文版序

应王承绪教授的邀请，为《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的中文版新版写一篇简短的序言，这是一桩荣誉，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在这 2000 年千年期之际，出个新版似乎是一个合适的时间，而且中国正是出这个新版的一个合适的地方。这本书的以前各版的框架建立在各国学校系统的基础上，而整个教育已经远远超出任何完全或者甚至主要地建立在学校系统的基础上的概念。在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重新定向方面，中国正在很多方面起着先锋的作用。

本书英文原版于 1958 年问世^①，从那时以来的四十多年里，我们大家已经在国家之间、国家内部，与那些从事教学的人们和现在整个一生都在学习和再学习得更加多得多的人们之间，都脱离了旧时的组织等级。在这次重新定向中，当在全世界领导着科研和教学的成千上万中国专家充分证明有关一切教育的目前地位和未来前景的新鲜思想的正确性的时候，中国成为国际的领袖。理由之一是，现在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把知识和技能看做为任何一个国家或“文明”或任何一个专家群体所垄断；我们也不能把“学问”看做永远或全部地为过去从学校和大学毕业的那些人所占有；他们几乎像不可挑战的，被假定是未来的真正的领路人。所有我们所继承的学校教育系统和它们所被授予的尊重和“准确”的等级更加日益受到质疑。

当然，正如我们的思想和情感不能避免我们母语的深奥微妙和

^① 最初的中文版译自 1979 年的新五版。——译者注

它所披上的文化上的细微差别，我们不能扔掉我们的过去。但是我们有很多人（事实上多数人）学习说其他语言。今天教育上的一项重大任务，是从旧的学校系统从上到下分等级组织的——而且常常是高度富于习语的自我表达方式的——“母语”，转向在世界各种文化之间和组成那些文化的每一种文化的群体和个人之间的更加全球化的沟通。所有这种转变的背景，乃是到处出现的许多技术的加速变化，这些变化还伴随着而且迫使在前进中的日常经验的前线所出现的种种职业、个人角色和终身再学习中的各种变化。

我说“再学习”，因为我们已经受过教育的人和成年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过去的俘虏，已经为过去所包围。但是，年轻人还没有那么牢固地成型。他们已经是那个前进中的前线的人。这种提法，对于那些还在我们中学高年级或开始进大学或参加工作的最年轻的成年人尤为正确。他们和我们一起学习和再学习。我们年长的人还是和他们一起学习并且向他们学习为好。我们并不抛弃我们的知识和技能；我们用新的标准检验它们，而且在需要时补充它们。这里，在每个国家内部和全世界存在着一切教育的转折点。让我们每天看一下在我们面前出现的一些证据。

在本书问世以来的四十余年间，一个一个国家消失了，更多的国家已经被分割或者与邻国结合。因此本书逐个国家地论述和学校组织的过细的分类已经同样地失去了正当的理由，虽然两种陈述的形式，由于与它们联系的那些结构和生活方式还继续存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正当的。——正如语言和文学，尽管习语和意义继续不断地转变，但经过很多世纪保持下来。另一方面，语言形式改变和转过来引起新的社会和语言学的意义的方式，提醒我们的“文明”乃是人类之间有关最重要的事物的继续不断的对话。

今天，更多的个人、更多的群体、更多的国家、更多的文化，都以越来越不相同的方式成为那个对话中的重要参加者。例如，在英国，大约有一半家庭有一台计算机供他们直接进入国际互联

网。很多家庭拥有一台以上计算机。事实上，特别是在年轻的成年人中，手掌大小的移动电话迅速增加，这种移动电话能够兼作计算机。各种各样的人经常为娱乐、购物、旅行和一般信息使用计算机。人们使用计算机随时向全世界发电子邮件（比寄航空信或者本地邮件便宜得多）。年轻人现在通过使用甚至一个时代以前没有想过的工具每天居住在一个全球化的“酝酿中的文明”之中。他们正在为他们自己和我们全体制造这种文明。教育家们忘记的一个结果是，有鉴于我在 30 年前“为不确定性而教育”的呼吁当时被很多人认为距离遥远，现在被普遍地认为这是目前不可避免的事，我们最年轻的成年人是主要的提倡者。

在过去，正规教育被横向地分成不同的和常常没有联系的学习。同样，正规教育被纵向地分等，成为为文明的建立和保持被假定具有不同价值的各个阶段。证书、资格和职业一劳永逸地规划了人们可能为人类的改善作出的贡献。虽然这里我使用了动词的过去式，我们正处在教育的一个危机点——特别是在学校教育，这种分类被制度化——因为所有这种假设的正确性越来越小。在今天的“信息社会”，建立在这种假设的基础上的划分，不但在实践中而且在人们的态度中正在消失。衣服、说话方式、食物爱好和各种各样活动或兴趣，都为不同年龄和背景的人们所共有。因此，日常的相互影响和可以共同得到的各种各样的学习，正在迅速地改变一直包围着我们的有效的教育，这种教育几乎一直对我们所受的正规教育表示怀疑。

教育中的巨大转变，以及特别是对正规教育的挑战，可以通过几个迹象十分简单地举些例子。我们仅仅通过进入世界信息交流，大家就都能够容易地不但通过诸如旅行、广播或阅读，而且首先通过电子工具，走出学校系统的边界和围着边界的规则。那并不仅仅意味着使用全世界的国际互联网；它也包括如使用参考资料这类例子。例如，我有一部 32 卷的《不列颠百科全书》，由于我担任了几

版百科全书的编辑工作，送了我一部。要买这部百科全书得花一笔巨款，但是很多富裕的家长为他们的子女作出这笔投资，而不那么富裕的家长得求助于图书馆和对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的冗长查询。但是，现在，整部百科全书都在光盘上，仅仅花买本小册子的钱就能买到。也能够在网上免费咨询，容易查到并相互参考条目。因此，当需要时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重新定向，取代今天正规的学校系统所体现的古时的界限和不利条件。甚至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看很久以前所写的书籍时，我们都需要重新考虑每一件事。《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已经出过五版，每一版都改动数据，而且审慎地引进一些新的观点或新的挑战；但是这个世界变化得那么快，每一版在某种程度上出版以后就会有问题或者不完善。

这就是我欢迎《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中文版出个新版的很好的理由，对出新版表示感激。对王承绪教授的创意，他给我连续不断的学术上的支持，以及他的宝贵的友谊致以最热情的感谢。

Edmund King
November 2000

中文版序

我的第一本比较教育专著（第五版）已译成中文，对此我感到光荣和极大的喜悦。使我特别感到愉快的是我尊敬的同事王承绪教授负责本书的翻译工作。对这一学术上的合作和 1983 年我访问杭州大学讲学时我夫人和我本人所受到的热诚款待，谨向王教授致以最衷心的感谢。

就在那一年，我荣幸地在北京师范大学受到顾明远教授和他的同事们的欢迎；又在华东师范大学受到钱景舫教授及其同事们的欢迎。这两所大学的师生给了我热情的款待，不仅对我个人如此，而且对技术革新引起的世界变化空前迅猛的时代所共同关心的教育问题的讨论也十分积极。同时，他们使我看到了中国人民热心教育事业的力量和机智。作为朋友和同事，当我们联合起来，共同为今天和明天的紧迫的教育问题寻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尽管我们的历史和目前的处境并不相同，他们却使我感到像在家里一样舒适。

除了与各大学的直接工作上的交往以外，另外一些杰出的中国同事还给了我机会，使我得以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各项建设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事业，其中教育的复兴所起的作用是如此引人注目。在除我讲学的几所大学以外的交往中，我特别要感谢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金世柏先生、北京大学汪永铨教授和国家教委黄仕琦先生。此外我还要感谢很多其他人，对他们我将永不忘怀。

所有这些朋友和同事在我逗留中国期间不仅在学术上为我铺平了道路，而且使我愉快地饱览名胜并建立了友谊。从那时以来，他们给我寄过许多信息，并介绍川流不息的中国客人到我所在的大学

和家里做客。我们都从这些国际交往中受益匪浅。

特别重要的是在 1983 年欢迎过我的中国同事以及后来参与翻译和出版《别国的学校和我们的学校——今日比较教育》的人，已经建立起实力雄厚的研究刊物和教学单位，致力于教育的比较研究。因此，在对我的著作被译成中文感到自然的满足以外，我热切地希望这个中译本能帮助广大中国同事和学生认识到教育的比较研究对任何国家的教育和社会发展进程与改进所能作出的重要贡献。

教育的比较研究之必要性

比较研究的价值，不仅来自对其他国家人民取得的成就或进行的实验所提供的实际知识，而且来自比较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可以补充我们自己看法的观点。的确，情况的不断变化向我们提出一连串的新问题，要求我们进行新的分析。这些比较分析可能证明长期存在的实践和观念是正确的；但它们更可能对已被今天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机会，特别是由于现代科学技术而更加易于得到的机会，证明是不正确的一些旧习惯提出疑问。

因此，真正的比较研究不只是研究其他国家的教育体系，而在于在我们走向未来的时候，更清楚地理解我们自己教育上的设想和实践。因为创造未来的人，不是我们教育者，比较研究就显得更为必要；必须创造并且不断地改造未来的是年轻人。他们将生活在一个我们并不知道而且也无法知道的世界，这是因为新的知识不断增加，而科学技术在各种职业和社会上的应用，要求对在学校或年轻人的交往中所学到的许多东西不断进行重新评价。

我们今天所共同面临的教育问题，毕竟有许多是过去从来没有提出过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需要前所未有的认识和各种不熟悉的技能。这个挑战由两个原因引起：第一，在学校教育结束以后，职业前景完全改变了；第二，在一切教育和训练内部，现在对学习有了十分不同的技术网络。不管我们原来的制度多么完善，我们从来没有要它来承担今天经过改组的教育制度所必须承担的任

务。

很多国家，像中国一样，面临人口的大多数年纪轻、而原来负责教育和训练的人年龄迅速老化的特殊问题。很多国家，又与中国一样，另外都还有人口的极大多数仍旧居住在农村或小城镇的复杂问题。但是，要有这么多人移居较大的市区或从事城市式的职业和前程，那就必须不仅要改造旧的教育职责和形式上的社会分工，而且要改造使不断的教育革新得以进行的多种渠道。

这个前景反过来要求我们必须从儿童幼年时期起对整个一生的重定方向有明确的认识和足够的准备。换言之，当我们继续依靠过去经久的原理和永恒的价值观念时，需要在未来不可知的环境中重新应用这份遗产。从某些方面说，这就要求今天一切真正有价值的教育都将是为无定而教育。

在世界各地，对我们的邻国怎样面对向我们提出挑战的教育上的种种无定情况进行比较研究，将会帮助我们，特别是今天的年轻成人，共同建设一个成功的未来。

本书出版以来发生的变化

显然，一个作者总是尽力叙述各国教育制度的最新细节，并尽可能公正地介绍有关当代教育政策的争论情况。但是，某些国家政策的不断发展，或者另外一些国家政策的倒退，总在学校组织方面带来一些审慎的变动，一般说来变动较大。所以，本书英文原版中所介绍的详细情况，自1979年第五版以来已有变化。但是，所有细节没有一处需要大的改写，因为所介绍的各国教育情况没有重大的变化。我所选择的几个国家，其教育制度的一般背景、学校设施及其重点，与1979年时相比基本照旧。

但是，在政府这个层次，政策上的一些大的转变应加以说明。在联合王国、美国和日本，政治上的保守主义削减了国家的教育经费，至少与上涨的生活费用成比例。在美国，联邦政府对教育事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和心提供教育经费的许多机构（这在1979年似乎

非常明显), 在本届政府已经倒退。但是, 1979 年时联邦政府所注意的那些教育需要和问题在广大美国人民中继续进行着激烈的争论; 所以, 本书美国教育这一章的记载应该看做稍过了时的快照, 以后可能再次成为生动的电影。

相反, 在联合王国和日本, 保守党政府明显地强化了集中化的过程, 而且正在把职业教育计划引进学校系统。有时教育部以外的政府部门, 例如, 主要负责就业的政府部门如英国的人力训练和就业委员会, 采用财政引诱的方法来进行; 但是一部分是由于教育部和新的考试机构对课程规划的直接干预所引起。在这两个国家, 更多地依赖私人教育, 一部分是为了节约税款, 一部分是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偏爱。无须指出, 目前这些政策也许会重新回到以前的样子, 或者在将来有所修改以适应变化中的环境的需要。

对教育实践和设想的一个非政治性的挑战,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电子计算机被广泛采用。在英国, 现在每所学校至少有一台电子计算机, 很多学校有若干台。在学校教育的最初几年就开始使用电子计算机、文字处理机或其他电子收录机, 例如与电视机相联的录像机和信息处理机。其他各国的学校现在也利用计算机帮助学习。同时, 在学校以外, 新技术的迅速推广和工商业对科学家的需求在很多国家很难吸引大学理科毕业生到学校任教并且留住他们, 因为工业方面工资比较高, 晋升的前景也比较好。在某种程度上, 前文所提到的通讯和学习的新技术工具能够补充教师所能提供的任何东西; 但是在某些学科中优秀合格教师的缺乏是危急的, 教师的士气普遍是低落的, 因为他们看到了年轻而有力量的同事抛弃教学工作, 教育内部的工资和晋升前景丧失了与其他职业的可比性。所有这一切反过来影响着很多家长甚至学生对教育的态度。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 在高中阶段提供高质量的学校教育的需要, 特别是以“新兴工业”所需要的新知识和新技能为方向的课程和训练, 正使很多国家的 14 岁或 16 岁以上的青年重新考虑或重新

组合学校的设施。与这一点相联系的是在这个阶段，虽然不是在这个年龄，为那些需要在旧课程之上增设新的课程或者探索知识的新领域，以便应付毕业很久以后的种种变化。1979年版曾经描写的有关这方面的某些变化，现在已经开始具体成型。教育改组的这个阶段或这个方面对比较研究来说是那么重要，世界比较教育学会大会在1984年决定在我指导下制定一个国际性的合作研究计划，以便收集证据，解释一系列新问题。

对这个阶段教育的全部挑战，由于普遍的失业以及短期就业问题变得更加严重了。在很多国家，年轻的成年人找不到职业，或者至少找不到永久性的职业。学校的前景和缺乏职业动机影响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在学校所学内容的价值。职业已经改变或者已经消失的年长的成年人，需要重新学习，改变学习的方法。关于成人学习改变的观点影响年轻人的学习，因而影响教师对年轻人的教育方法。

所有这些发展可以说明在教育设施方面越来越关心可供选择的教育方法，以及各个教育阶段和各种教育形式之间的交替，这种情况有时发生在成人生活方面，但是有时也发生在一向认为属于学校或学院的年龄阶段。显然，如果人们在受雇工作或在家教育儿童的时候必须学习和再学习，那么教育设施所及的范围必须扩充，方式必须多样而精巧。

在儿童本身，入学儿童人数也发生了巨大的人口统计上的变化。在很多国家，出生率显著下降，以至有许多学校校舍不再需要，可供他用。另一方面，很多年轻人延长在学校或学院学习的时间，越来越与重新回校学习的成年人一起学习。所以，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传统意义上的“学校”，是否是进行比较新的教育和训练的适当环境。新近扩充它们教育设施的国家对工业化较久的国家的教育设想越来越产生怀疑，反过来正在学习根据比较新型国家的经验重新考虑它们的教育设施。